

95名美术少年从1960走来

隆福寺街 78号

78 Longfusi
Street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64届毕业生集体撰稿

隆福寺街78号

95名美术少年从1960走来

78 LongFuSi Street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隆福寺街78号 /《隆福寺街78号》编委会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 2011.8

ISBN 978 - 7 - 5039 - 5028 - 5

I . ① 隆 … II . ① 隆 … III . ①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2132号

隆福寺街78号

编 著 《隆福寺街78号》编委会
责任编辑 李恩祥 张勍倩
装帧设计 刘玲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58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34.5
字 数 350千字 图片860余幅
书 号 ISBN 978-7-5039-5028-5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编委会名单

策 划: 李小可

主 编: 赵 衡

编 委: 邓领祥 丁世儒 郝惠芬

李小可 李国建 王秀琴

王植民 张怡庄 赵 衡

隆福寺街 78 号

前 言

:: 赵允安 /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教导处原主任、校长



丁文与赵允安两任校长在校庆庆典上

本书中的“艺术少年”是美院附中（全称为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1960—1964年的学生。他们入学后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美术学院和附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毕业那年又赶上了美术学院因“社教”停止招生，失去了升入中央美术学院的机会。当时部分学生考入了其他艺术院校，多数同学分配了工作。即使最幸运的学生，也不可能避免地经历了十年浩劫等总形势带来的各种坎坷，少数同学更经历了沉重的政治迫害和生活上的打击。

在困难面前，他们坚韧顽强、无怨无悔、追求真理，抱着美好的信念和命运抗争；他们奋发图强面对生活，无论分配在什么工作岗位上，他们都尽最大的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无论学习什么专业，他们努力成为这行业的专家骨干；不管毕业时能不能升学，一有机会他们就刻苦学习，在专业上获得卓著成绩。

如今，当年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少年，经过多年奋斗，已逾花甲之年，重新聚首，满怀激情地回忆往事，编写了这本书，奉献给大家，奉献给母校美院附中。

我作为老师，与学生一起成长于那个年代，一同在附中这个大家庭中摸索前行。五十多年后看到这本书，百感交集。

美院附中是建国初期徐悲鸿等老一辈艺术教育家为提高中国美术人才的水平而决定创建的。回顾1953年丁井文校长受命组建附中时，一切从零开始。那时新中国朝气蓬勃，全社会的人都以极大的热情献身国家需要，对于筹建附中这样一个全新的任务，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工作中没有条条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丁校长打破常规



1998年9月，赵允安校长（左四）和六四届一班的女生们在附中四十五周年校庆活动中合影

组建了教职员队伍，根据中国美术教育的实际需要，参考苏联美术教育的资料制定了教学方针、计划，制备必要的硬件设施……学校很快就招生开学了。丁校长以他那特有的人格魅力，团结大家，号召教职员都以校为家、无私奉献、教书育人、团结奋斗，人人都像班主任那样关心学生，这成为附中教职员的传统；他鼓励学生勤奋学习、亲近劳动群众、认真锻炼身体，这在学生中形成风气。

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不断总结、提高，培养出众多有良好的精神品质、有扎实的专业和文化基础的毕业生。规模不大的美院附中，却有令人瞩目的成材率。一批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毕业生从这里走向高等院校、奔向全国各式各样的美术工作岗位。他们在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母校赢得了荣誉。

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不同了。中国的美术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和变化，美院附中也有新的进步。但是我认为，这本书所散发的积极精神、图文中透露出的丰富信息，对我们仍然是一种难得的滋养；对于办教育的人来说，也一定能从这本书中得到宝贵的启示。

2010年5月11日于北京亦庄

序一

孙伟 /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校长
许娟 /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党委书记

这是一部凝结了七年心血的回忆录，年近古稀的你们，用饱含款款深情的文笔讲述着师生之情，述说着同窗之谊，字里行间流淌的是感念母校的情怀。这份源自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深深触动着我们这些晚辈后生们。

岁月悄然转动着不息的年轮，日月如梭，五十年的岁月流转，弹指一挥间，回首过去，沧桑巨变。流逝的光阴带走了你们的青春，却留下无尽的回忆。无论有过怎样的快乐或苦恼、成功或失落、幸运或不幸，而今，穿越时空隧道，你们认定：1960年至1964年——中央美院附中的四年，是你们的生命历程中最可宝贵、最为难忘的一段岁月。因为隆福寺街78号院那爬满爬山虎的红色教学楼里记录着你们少年的足迹，操场东面那棵每逢深秋便硕果累累的枣树见证了你们无悔的青春。

亲爱的六四届校友们，如果说母校为你们奠定了人生的基石，你们则用美丽的年华与坚韧执著为母校增添了迷人的光彩，铸就了美院附中今日的辉煌。数十年的风雨耕耘与磨砺奋进，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播种着人生的希望，以理想的光焰照耀着母校的精神，用卓越的艺术成就打造了母校亮丽的名片。母校为你们的累累硕果而欣慰，为你们的成绩而骄傲。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岁月的流逝不会冲淡母校对你们的深切惦念，时光的年轮不能带走母校对你们的浓浓思念。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你们都是母校永远的情感牵挂，母校是你们永远的精神港湾。

亲爱的校友们，今天的附中已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中等美术学校，这是几代人努力的成果，也有你们为之奋斗的身影，母校不会忘记。

附中的晚辈后生们为你们喝彩！向你们致敬！

祝愿你们艺术之树常青！

2010年10月

为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那一段难忘的岁月击掌（序二）

孙景波

这是一部我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0—1964）同届同学的群体回忆录；是一部充满特别感怀之情回顾自己青少年时代成长足迹的文献。

1960年——五十年前，我们九十一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少年，怀着同样的爱好和梦想走进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校门。1964年——四十六年前，八十余名同届学生离开了这所被我们称为“永远的母校”的地方。从此，天各一方，他乡异国，遭遇不一。



2003年11月，在中央美术学院新校舍落成典礼上附中学代表孙景波发表演讲

半个世纪的历史车轮又缓慢地辗过。这群年逾六十、逼近七十的老男生和老女生们重聚北京，回顾以往，无论各自曾有过怎样的快乐或苦恼，成功或失落，幸运或不幸，当越过时光隧道，度过“耳顺”之后，最终一致认同：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四年，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历程中最最重要的，最难以忘怀的一段岁月！”

1960—1964年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七岁到十岁的“童年时代”，那是她处境最艰辛却最富有顽强生命力的生长期；是她物质条件最匮乏，却格外富有事业理想和强烈生存欲望的发育期；那是一个开拓者的群体在创业初期充满探索勇气和创造热情的年代！

这样的感受，让我们对1960—1964年的回忆，充满了对母校、对当年老师们的感恩之情。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那一段无愧无悔的青春时代的巡礼。

我们庆幸，在那个时期我们有过“怎样的”精神风貌

我记得，开学的第一天，第一次全体班会，同学们各自通报姓名作自我介绍。一个黑黑瘦瘦的男生从墙角举手起立，忽闪着一双大眼睛说：“我叫吴浪平，抗日胜利那年生的，我爹说：大风大浪过去了，从此天下该太平了，就叫无浪平吧！”

接茬儿站起来的是一个细高个儿细眯眼的男生：“我的名字和他有相同的意思，也是抗战胜利那年生的。我叫梁平波，不过那年的‘波’并没有平，我父亲是革命军人，接下来又打了三年仗。”两个人的自我介绍，引发了全班同学一阵“心照不宣”的笑声。是的，我们全班同学大都是在1945年前后出生的。

文学老师赵昔在推荐王怀庆同学三年级的一篇作文时读道：“我妈指着炕头上那把快磨秃了的‘笤帚疙瘩’说：‘你生下来时，就那个样子！’”——那种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的样子，综合着我们同代人所共有的“人之初”的形象记忆。

这个大体相近的出生年月，决定了我们那一代人遭遇的共同命运。抗战胜利，随后的三年国内战争；新中国初建后，三年的“抗美援朝”和国内同时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1956年经济建设刚有了些生机，1957年又来了一场“反右斗争”；随即而来的是1958年，共和国经历了“大跃进”，那样一场消耗国力的“折腾”之后，民族“精神透支”，国家“元气大伤”！

处于十五六岁至十八九岁的同学们，正在青春期。那几年，举国痛感“双重饥渴”（“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毋庸讳言，也毋庸赘言，1962年我国和“变了色的”苏联老大哥绝交，为了还贷，“雪上加霜”——全中国八万万同胞都勒紧了腰带！

我回忆，陷入艰苦条件的同代人很少怨天尤人，小小年纪都有同甘共苦的信念。生于忧患的我们，过早地懂得个人与民族命运荣辱攸关的联系，明白了国家要奋发图强，人民要自力更生的道理。那是一种时代群体自觉的历史使命感。成长于那个艰苦岁月的我们，懂得获得的“有限定性”的知识，比“限量”配给的口粮还珍贵，炼成了一种在困境中必须要“熬得过去”的坚韧意志和耐受力。

那时，在我们同学间流传过一个真实的，却更像被演绎过的故事——1962年初夏，上课间操的时候，风雨骤至，课余间歇，山西农村来的卫国珍同学，一个人从容不迫地跑进操场。很快她便浑身湿透，却仍然仰望电闪雷鸣的天空，张开双臂，高声朗诵高尔基的诗篇《海燕》：“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人们或许会以为她病了，其实她很正常。也许正是这样一幕戏剧化的情景，象征性地发泄了、表述了我们那一代人对自己命运的抗争和带着幼稚印记的豪迈之情。

那时，很少有人炫耀、追求个人的生活优越感，以艰苦朴素为荣的风气弥漫全校。

打补丁，成为女同学们追求的“审美时尚”。她们抢着帮男同学缝补衣服、拆洗被褥，助人为乐，亲密无间。

那时，谁有了点儿能和同学“同享乐”的“资本”，谁就会“共产主义”地拿出来。这，让我想起黄冠余同学。当年，他用两毛钱买了四根小豆冰棍，在分送给在场的三位同学时说出的豪言壮语：“共享乐吧！朋友们！苟富贵，莫相忘！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回味，在那样的少年时代，那是一种慷慨情怀的张扬。

那时，我难忘，同学间“共患难”的真情。我记得，张萍实同学二年级时患上了传染性肺病，他害怕一个人被隔离的孤独与寂寞，心情痛苦难言。同学师恕培知道后，自告奋勇与他为伴：“我身体好，有抵抗力，我陪他住！”四十七年后，2007年，师恕培在深圳突发脑溢血。在京的同学闻讯后，电讯相传，二十四小时内集得捐助款十万元，派代表火速送到深圳手术病房。就这样，救了一个昔日同窗的生命！这种“天长地久”的班级恋，谁能忘怀！

60年代，那是一个被“斗争哲学”和“革命激情”点燃“青春理想”的岁月。上山、下乡，我们班的同学走到哪里，哪里就一团火热，干农活和社员一道，争先恐后，手脚磨破了，忍痛坚持，晚上给乡亲们演节目，一场《白毛女》，台上动真情，台下流热泪。“孩子们哪！你们这些大活人演得比电影还真哪！让我哭得都岔了气啊！”一位大娘对我们说。待实习结束，离别之日，乡亲们拉着同学们，“说什么哪？给我们家挑水，给我们家打扫院子，帮我们干地里的活，说什么好啊！你们就像当年的老八路军！舍不得你们走啊！”惹得我们也泪流满面。我们自豪，为那时有过“那样可爱的我们”！

我难忘，那时我们在校学习生活的情景：早晨六点起床，像士兵一样，两分钟内叠好被褥，飞速跑到洗脸房，五分钟后，在操场上集合上早操，六点半早自习，七点半吃早饭，八点上课，上午四节，下午两节，两节晚自习。没有无故旷课的人，极少迟到的人。周末，到北京火车站，到景山公园，到故宫，到隆福寺大街小巷画速写。忍着饥饿，忍着酷暑或严寒，经常画到天黑下来看不清画面为止。那时同学间比什么？比勤奋，比刻苦，比谁画得多，比谁画得有味道，只要打开画夹，便乐在其中。如果听到老师或同学说“你又进步了”，那是我们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刻！

我们向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校长和老师们深深鞠躬！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那不是一天，那是四年！那不止四年，那是我们的永远！
1964年初夏，当我们这一届同学面临毕业，正兴致勃勃准备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

时候，忽然传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中央美术学院被勒令“关、停、整、改”——棍子打在了美院身上，同时殃及附中。感觉最直接、最痛的是我们这即将毕业的一届。从那一刻起，我们渴望到大学本科深造、在附中企盼了四年的梦想，全被那突如其来的“一棍子”击碎了！我们这些艺术少年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尝到了失落的痛楚和无奈，好似突然遭遇风霜的树叶，身不由己地飘散四方！

两年后，是“十年浩劫”。更意外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和附中的校门一关就是十四年，少年人已步入中年！

这些五十年来在江河湖海中搏击，在生活的风浪中闯荡却始终没有丢掉画笔，也未能再上过大学的同学，最终既感到心酸又感到自豪地意识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是我们永远的母校！”

正因为最初艺术真理的指向，也是艺术真理的终极，我们在生活历程中每获得一点成就，都会自然地联想起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获得的启示。

“整体而言，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学生在专业能力上，并不比大学本科生们差，他们更年轻，更单纯，更有朝气。”这是那个年代美术用人单位对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生的评价。我们珍惜学校这令人自豪的声誉。我们用自己的创造和实践能力为中央美院附中赢得了骄傲。

此刻让我们回顾：那一年，我们的丁井文校长刚近不惑之年。1953年，他接受了徐悲鸿院长的任命，怀着要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办成一所中国第一、亚洲最好，要超过苏联列宾美院附中的愿望。他为附中从中央美术学院挑选了一批最有才干的青年教师、一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形成了一支比大学本部还有朝气的师资队伍。他爱才，鼓励创作；他处事冷静，待人宽容。在那个风行“左倾”思潮的岁月，他用他特殊的资历（曾在毛主席的警卫连工作）和身份，支持并保护了美术界和校内师生们受到争议的创作探索。他是我们心中的“老爸”，他几乎记得住我们所有同学的姓名，他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感到过一种来自父亲般的关照。我难忘，1964年9月5日，他和教导主任李桦先生到汽车站为我和张铁兵同学赴云南工作送行，一双发抖的手紧紧地拉着我们：“到边疆遇到困难给学校来信，相信你俩的业务能力，一定会出成绩。和当地人一道工作时，要谦虚，别骄傲。啊？云南树多，孙景波不要老爬树，都长大了，要稳重些……”我看他眼睛湿了，我的眼睛，也湿了。

1968年4月，“文革”的第三年，我再见丁校长时，他正被关押在附中四楼的一间学生宿舍改成的禁闭室里，看我有些尴尬的样子，反倒讪笑着小声安慰我说：“别担心，同学们批斗我都是在做做样子，他们把我关到这儿，是为了保护我。”我相信，我大多数的学弟们都会有一颗“丁井文影响下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生的良心”。



高一班同学们在雕塑大卫像前合影（前排左起：王植民、叶旦妮、张怡庄、庄红胜、傅靖生、孙景波、黄冠余；中排左起：张学彦、葛乐业、张朝阳、王秦生；后排左起：张健平、王怀庆、杜文成）

上个世纪60年代上半叶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是“丁井文的时代”，也是那个时期前后几届师生们最辉煌的岁月！

请看1960—1964年前后，教师们的创作成就：高潮和秦岭先生为历史博物馆完成了油画《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孙滋溪主持集体创作的巨幅素描《当代英雄》随后问世。接下来，又有沈今声先生的油画《登珠穆朗玛峰》，赵友萍先生的油画《藏族女代表》、《百万农奴站起来》，王德娟先生的油画《曙光初照演兵场》，于月川先生的中国画《农奴的小学生们》，马常利先生的油画《风雪大庆人》，卢炳炎（卢沉）先生的中

国画《机车大夫》，孙滋溪先生的《两个小八路》、《天安门前》，罗尔纯先生的油画《长征路上》，而王文彬和温葆先生也带着他们的毕业创作油画《夯歌》和《四个姑娘》从美院来到附中……这些先后入选当年全国美展的作品，让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教师群体备受全国观众瞩目，在美术界引起广泛赞誉，成为那个时期中国画坛的代表作而影响至今。当年被丁校长和教务长赵允安从中央美术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中抽调入附中的卫祖荫、谭权书、李行简、王同仁等年轻先生，十五年后这些附中的教师全部调入中央美院，成为各专业系科的学术带头人。

我们感谢，当时留校给我们当专业课辅导员的张京生、景玉书、王存德、姚重庆等老师，作为我们的学长，他们把附中的校风和精神传统带到了我们中间，他们和我们年龄相近，能有推心置腹地交流，情同兄弟，让我们体会到良师益友的感受难得。

我们感谢当年附中的老师们，在那艰辛、困苦的条件下，他们真诚地、富有远见地要求我们“打好造型基本功”。他们曾尽全力让我们获得了较为扎实的绘画与创作的基本技能。

为了适应美院不同专业的需求，中央美院附中设置了多样的课程，除特别重视素描造型基本功外，还设置有中国画的写意人物、工笔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篆刻；西画的水彩、油画、版画、雕塑、书籍设计等课程。每一种技法的教学时间虽然短暂，但教师认真，学生用心，这让我们那一届大多在毕业后都直接走进了社会的中专生，有了较广泛的适应能力。那时，我们的老师们正年轻，他们用燃烧的青春热情点燃了我们的艺术心灵。

当年，附中文化课的老师们也同样出类拔萃。文学老师王光楣、李桦（兼教导主任）、赵昔、陈天启、宋淑兰；物理、化学老师解强、王应芳；外语老师杨连根、索维奇，体育老师韦吉顺，他们的学识和在教学中表现出的诲人不倦的态度，让我们印象深刻。可以说，我们那些先生的风貌、口才，讲课时对学生的感染力，是我后来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教师中都不曾多见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学与历史教师王光楣先生上课时，他精彩、生动的表述，常常被我们感动的掌声打断！他们让我们爱上了那时所有的课程。

我们感念，感念当时学校图书馆的孟泽霖、齐敬儒、杨光河老师，感念在我们食堂做饭菜的大师傅们，感念传达室的李大爷、赵大爷。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我们真地感到了一种全校师生员工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信念与精神。

1960—1964年，中国的政治气候冷暖莫测，“文革”风暴尚未到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当时形成的一种“温室小气候”，我们今天回味起来都感到侥幸和庆幸，甚至是感激。那是寒季里回暖的现象，在一个学校的历史中，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因为有

了那么一个群体，有了那么一批特别有热情、有能量、有感召力的人，他们排除了外部干扰，抱团聚集在一起，像一堆燃烧的火柴，于是产生了“火热一炉”的“同温效应”——炉火中的矿石都熔解了，出炉时都是铁水，锻造后都是钢材。凡在这“火热一炉”中修炼过的人，他们的眼光、志向、品位、情趣、格调、综合素养，都会相互感应地发生“质”的升华。这种“火热一炉”的效应，甚至会带动，会影响全校的学风！

2003年，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庆祝五十周年校庆那天，学校让我作为老校友代表到台上发言。我记不清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当时我很动情，一刻钟的发言，前后被在座的几百位校友们十几次经久不息、由衷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泪眼蒙眬中，我也看见了校友们闪亮的泪花！

庆典结束，各届附中校友到丁井文校长的塑像前轮流合影，我们发现，1960—1964届同学人数最多。包括许多家在外地的人，能来的，都来了。我们说：“我们是最爱附中的一届！”这是历史，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自我感觉，让我们这群老男生和老女生，有了一种特别的“未了情”。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愿望——为纪念我们入学五十周年，在2010年暑期之前，我们班同学办一个展览或者出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吧！

于是，推举李小可同学作总策划，小可说：“我们活着的人，都得参加，一个都不能少！”

于是，推举我们当中的文学才女赵蘅作本书主编。半个月前，她告诉我：“稿件已齐，我们活着的能找到的同学，基本都到齐了。”

我受命为本书作序。

本序的献词是：

本书谨献给我们永远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献给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师长和同学们！

献给我们当年和现在附中的先生们！

献给正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的小校友们！

献给将来走进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孩子们！

艺术家的摇篮^①

——中央美院建校40周年桃李遍天下

● 刘国华^②



刘国华在办公室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是在我国著名美术家徐悲鸿和江丰等老前辈大师的倡导下于1953年创建起来的，它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隶属于文化部。四十年来，这所艺术摇篮已培育了近千名毕业生，他们多已成为美术专业的骨干，成为知名艺术家、设计家、工艺家、讲师、教授、影视舞台艺术家、艺术理论家、编辑等，他们遍布在祖国各地，为祖国的美术事业、为世界的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人们形象地赞誉，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是“小盆栽大树”；确实，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家的摇篮，她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赞许和声誉，已成为全国热爱美术的青少年向往的艺术殿堂，她已成为我国美术基础教育的重要阵地。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关键在于有一个远见卓识的领导班子和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创始人丁井文校长在建校初期，从中央美术学院和各高等艺术院校精心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毕业生到附中任教，以后又不断地选拔优秀人才扩充附中的教师队伍，就是这些忠诚于教育事业、具有深厚艺术造诣、热爱学生、积极进取的园丁们，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美术人才。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注重教育质量，通过四年严格的科学的系统的专业训练和文化

1. 原刊于《经济日报》1993年10月29日第八版。

2. 作者刘国华时为中国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



1968年，“文革”期间，江西省革委会组织全国各地画家，前往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进行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这是孙滋溪老师（左二）和黄冠余（左一）、刘国华（左三）、王怀庆（右一）深入生活并在井冈山茅坪八角楼前的留影

学习，使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打下了扎实的、良好的专业和文化基础。经过四十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美术基础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的教学经验，形成了特色。为进一步适应改革开放的社会需要，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不断进行教育改革，经过改善、丰富、充实、拓展，保持和发扬优势，拓展专业学科，为逐步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的美术和设计基础教育的完善体系而努力。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0—1964年教职员名录

1. 行政人员：

校 长 — 丁井文	于月川 (女)
校长办公室秘书 — 张中新 (女)	色彩课
教导主任 — 赵允安 (女)	赵友萍 (女)
总务科 — 陈延生 张清河	卫祖荫
图书馆 — 齐敬如 (女) 孟泽霖 (兼历史课)	张京生 (兼一班班主任)
团总支书记 — 丁士中 温 葆 (女 兼素描课)	纪经中
团总支副书记 — 张 文	3. 文化课教员：
医务室 — 刘松珍 (女)	政治课
辅导员 — 姚重庆	李 桦 严 跃 (女)

2. 美术业务课教员：

素描课	语文课
高亚光 (女)	陈天启
王德娟 (女)	宋淑兰 (女)
孙滋溪 (兼创作课)	赵 昔 (女 兼图书管理员)
任之玉 (女)	王光楣 (兼历史课)
杨红太 (兼创作课)	物理课
马常利 (素描兼创作)	王应芳
景玉书	俄语课
王存德	索维奇
沈今生 (兼班主任)	杨连根 (兼一班班主任)
仇凤舞 (兼二班班主任)	化学课
国画课	解 强
卢炳炎 (兼速写课)	体育课
王同仁 (国画人物)	韦吉顺